



前郭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前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封建旗王齐默特色木丕勒二、三事

.....关 奎 宝彦图(1)

刘家围子流血惨案前后

.....王文忠(7)

大地主陈万财发家史

.....吴云圃撰稿 宝祥翻译 宝彦图整理(19)

红日映丹心 碧血浴草原.....王文忠整理(25)

——记冯洪泉烈士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分布概况

.....张静岩(29)

小
资
料
五
则

我国有哪些民族自治的地方·····	(36)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	(41)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	(43)
台湾概况·····	(46)
香港、澳门概况·····	(47)
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48)
征稿启事·····	(49)

封建旗王齐默特色木丕勒二、三事

关 奎 宝库图

齐默特色木丕勒（以下简称齐默特）是统治郭尔罗斯前旗的封建世袭王公的最后一个旗王。此人从1897年继承其祖父的爵位成了统治郭尔罗斯前旗的亲王，到1931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升为伪满蒙政部大臣为止，直接统治郭尔罗斯前旗近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直至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等动乱。在这些变革和动乱中，齐默特的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反而有升无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郭尔罗斯前旗的广大蒙古族人民仍旧生活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浸泡在愚昧落后、穷困灾难的苦海中，看不见社会变革的曙光，听不到世纪的脚步声，这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有关，和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齐默特的反动统治更有直接关系。齐默特作为一个末代王公，虽已歿世，但他一生的所做所为，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侧面，应公之于众，供研究分析历史资料。可惜我们的手头缺少资料，仅就我们所知略述一、二。

一、只修庙 不办校

原来清朝政府为了统治奴化蒙古族不惜耗费巨资，在蒙古各旗大修寺庙，鼓励蒙古人送子弟入庙当喇嘛。清朝末

年，当时不足三万人口的郭尔罗斯前旗就有四座大寺庙，象四座堡垒立在广大草原的四角，最多时喇嘛人数超过千人，占当时男性人口的10%左右。据老人们讲，在那个时候只有念佛经的，没有念诗文的，足见寺庙和喇嘛在蒙古族社会中的影响。

齐默特执政之后不久，适逢辛亥革命，清朝皇帝倒台，封建统治的根基动摇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王公制度保存下来了。可是郭尔罗斯前旗处在各县的包围之中，孤零零的小封建王朝，确保不变也不容易。齐默特知道要巩固封建统治政权，就要抵制外来影响，就要整治好自己的臣民。整治臣民的好办法，就是不让接触外界事务。所以，他想到的第一个救命稻草就是进一步愚化人民，只准当喇嘛念经，不准上学读书，使之永远保持愚昧落后的状态。

郭尔罗斯前旗历来就是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清朝科举时代也没出过一名举人、秀才之类，全旗连一个象样的封建文人也没出现过。到了二十年代，毗邻的扶余、大赉、农安等县已经有了小学到中学的新式学校，这个旗却一所小学也没有。连教私塾的几个蒙古族老先生也都是辽热一带人。齐默特不但自己不办教育而且限制旗民子女到外地上学。本旗小城子屯陈姓地主送子到外县上学，被齐默特发觉之后勒令家长追回。后由家长托人求情几经周折，花了不少钱，谎报已经退学回家，才算了事。

齐默特不但反对旗民受教育，连自己的军队也不准有新变化。二十年代初，张作霖派军官到本旗视察旗兵情况，要看旗兵操练，旗兵的哨官不会喊口令，队列走到墙根，哨官

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只好喊：大家回来！

东北军的视察官看了之后涕笑皆非。临走时告诉齐默特派一名青年军官到奉天讲武堂学习。齐默特迫于形势，送查于花努图克川户屯的吴××去讲武堂学习，几个月之后，被同班军官约去照了一次像。吴××出于某种心理，把像片献给了齐默特，原来齐默特分不清军衔的高低，左右人告诉他，照片上除吴××之外都是团以上军官，这一下引起了齐默特的惊慌和猜忌。假期之后再没让吴××去讲武堂学习。并向讲武堂谎报“吴××暴病身亡”而了事。

齐默特反对和阻止旗民接触外界事务，但对寺庙却关心倍至。把宗教当做他巩固封建政权的有力支柱，尽量扩大宗教特权。齐默特的叔父是扎萨克喇嘛（即执政喇嘛），统管四座寺庙。寺庙的大事小情，连喇嘛做了坏事犯了罪，地方也无权过问。地方的事务扎萨克喇嘛却有权过问。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辽热一带的蒙古人流入本旗的逐日增多，齐默特为了统治这些流民，同时也为了扩大寺庙的势力，规定凡流入本旗的外旗人，必须随庙为奴，否则不准在本旗境内落脚，这样每个寺庙都拥有十几户、几十户庙奴。这些庙奴每逢春种秋收和各种宗教活动季节必须到庙里进行无偿劳动。

齐默特为了让寺庙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把大片土地划归寺庙，寺庙有权雇工种地，出租土地，蓄养牲畜。一座寺庙几乎等于一座地主庄园，所不同的是，寺庙的农牧业生产的收入不纳税、不交公，全部充作寺庙经费。这样寺庙都有固定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再加上通过各种宗教活动从老百姓手里赚来的财物，就可以使数量庞大的不事生产的喇嘛不愁

吃穿。无怪乎那个时代有的贫苦老百姓把独生子也送到庙里当喇嘛，为得是躲避饥寒。

每个寺庙每年都要举行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动。有些活动完全是由执政者操纵的，宣传迷信思想，增加人民负担，比如每逢灾年就要搞念诵“驱灾经”的活动，平常年头就要搞念诵“太平经”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带有强迫性的（和官厅有关的地主豪绅倡导），不论信与不信，有钱没钱都得参加，连穷得没有隔夜粮的贫民，借阎王债也得接待喇嘛念经。

二、联姻攀亲勾结东北军阀

张作相是东北军伐张作霖的左右手之一，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齐默特和他拉上了关系，攀上了儿女亲，齐默特的儿子身染痼疾，奄奄一息本来不宜结婚。但齐默特和军伐拉关系，目的不在婚姻本身，而在于结成新的社会关系。所以，很快为他们的儿女举行了盛大婚礼。可是就在洞房花烛之夜，齐默特的儿子病情加重，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了。在那个封建礼教很重的时代，新娘一看新郎身亡，也吞金而死。婚礼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新郎新娘双双死掉，可是两家的儿女亲这一重要社会关系却名正言顺的确定下来了。从此，郭尔罗斯前旗的王爷同东北的重要人物张作相是儿女亲，这一重要新闻在东北人人皆知了。在那个兵匪为患的年代，单凭齐默特自己那点破烂武装是很难维持他王爷宝座的。但从结亲之后，齐默特的武装逐渐得到改善，而且在剿匪维持治安上也经常受到东北军的帮助，这些对维持齐默特的封建统治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么张作相为什么把女儿许给要死的病人？过后人们才

知道，除了企图借重他“草原亲王”的头衔之外，更重要的是垂涎于他的大片草原。不久，齐默特就赠给张作相可耕草原一百二十方（每方五十垧）。接着又放了乾安荒。当时，东北军伐正面临繁重的军费无法筹措的困境。蒙古旗内大片草原正是屯垦养兵，筹措军饷的好场所。所以，齐默特如此靠近军伐，并且这样大方，当然大受欢迎，受到保护。从此，齐默特的腰杆更硬了。

东北易帜后的第二年，在长春召开了哲盟王公会议，由当时担任哲盟盟长的齐默特主持会议。这算是南北统一后由南京政府委托张学良召开的第一次王公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旗王公及其代表之外，还有所谓拥护新政的蒙古平民同志会代表。会议议题是三民主义和执行新政等问题，会上意见纷争，各旗王公认为三民主义不适于蒙古各地，应仍保持封建王公制度；所谓新派人物则认为应奉行新政，让平民参政，改革封建王公制度。主持会议的齐默特当然也是一切新政的反对者，但他不愿提出反对意见，知道那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所以，在他主持下起草了《会议建议书》（见民国十八年4月29日《新民晚报》）。这个《建议书》的中心意思是：蒙旗各地民智未开，思想落伍，不宜急于革新，必须在保持王公制度的前提下逐渐执行新政。这个建议平息了两派的争论，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步伐加快，局势紧张，南京政府、东北当局都无暇顾及王公事务，无非是开个会走个形式罢了。但是这次会议却成了齐默特的亮相机会，使各派反动人物认识到齐默特是个值得利用的人物。

三、投靠日本当了败类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就在蒙古各地活动，齐默特的府中就有一所专为日本人准备的房舍，平时封闭着，只有日本人来了之后才开启房门。除了齐默特的心腹之外别人不准接近。伪满初，给齐默特当顾问的富田三郎，就是那个时候拉上关系的。所以，九·一八事变之后，齐默特立即参与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在郑家屯召开的各旗王公会议上，齐默特按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全部接受了建立伪满洲国改革蒙古行政区域的规划。成了各旗王公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带头羊。因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嘉奖，爬上了蒙政部大臣的宝库。

齐默特于1941年死去。

刘家围子流血惨案前后

· 王文忠 ·

三十八年前的农历五月初五，叛匪陈万才等与恶霸地主、盗寇惯匪勾结，经过密谋策划，设置埋伏，截击汽车，枪杀了我军指战员二十一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郭前旗刘家围子流血惨案。至今思之，令人悲痛不已。根据座谈搜集和知情人提供材料，撰成此文，借以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寄托我们对烈士的哀思，惠及后人。

一、治安队由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东北进行全面控制。在“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口号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样，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政治上操纵伪满“皇帝”溥仪，掌握政府实权；在经济上实行全面掠夺；在文化上更是疯狂地践踏。不仅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而且还在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统治机构，残酷推行“治安肃正”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日伪军警宪特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于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进行残忍的屠杀和迫害，把伪满洲变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集中营，无限悲惨的人间地狱。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伪满洲国在郭尔罗斯前旗仍维

护原有的旧制度，继续利用蒙古族的王公贵族统治蒙古人民，借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首先对王公贵族封官加爵，把世袭反动统治者——齐默特色木丕勒拉上来，充当了伪兴安总署署长和伪满洲国“蒙政部大臣”等傀儡职务；同时，建立了警察队伍，扩充了警备队。郭前旗的恶霸地主、惯匪头子陈达力充任警备大队长。他们在国难临头之时，未能激起爱国热忱，与国人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日本侵略者鸣锣开道，当忠实走狗，搞民族分裂活动，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政策。一九四〇年间，陈达力跪倒在日本侵略者脚下，奉命组成讨伐队，由他率领去东北的桦甸、蛟河和五常等地讨伐，阻击我抗日联军，杀害我革命志士。在激战中，陈达力的手指被打掉一节，最后返回郭尔罗斯前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祖国光复，郭前旗各族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获得解放。但是，蒋介石国民党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曾于八月十三日向全国各地发布“建立地方武装”的训令。八月十六日，伪郭前旗农业中学校长蒋晓予（即蒋恩彤），以国民党郭前旗党部书记长身份，召集各方代表会议，按蒋介石训令要求，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达木林多尔吉为委员长，蒋晓予任秘书。接着，把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警备大队，摇身一变改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治安大队，陈达力仍任治安大队长，王常宝任副大队长。治安大队接受了伪旗公署警务科和警察署的枪支弹药及其它物资。将治安大队编成两个中队，福胜和那逊大贵分别任中队长，老七哥、谢风阁等任小队长。

为了扩充治安大队的势力，一九四六年十月，在王府、新店两地招收部分伪警察、伪官吏和一些兵痞，又编成两个

中队。至此，治安大队共辖四个中队，改称为一、二、三、四中队。王府为三中队，关兴武任中队长；新庙为四中队，包启明任中队长，陈万才任副中队长。陈达力的治安大队控制着整个县城的中、南、北三部；西部被伪大老爷府警察署长（后改为保安队队长）包清俊控制着。当时，整个前郭罗斯上空黑云密布，广大蒙汉各族人民寝食不宁，盼望安定民生。

二、陈万才叛变

日本侵略者失败，伪满洲国垮台，蒋介石国民党与伪官吏、伪警察和封建王公贵族勾结，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和治安大队，妄图维护其封建统治制度，阻挡社会前进。但是，事与愿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经过酝酿协商，由高万宝扎布、孙殿忠、包文明等人发起，一大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大同会，在我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同志积极支持和指导下宣告正式成立。

大同会一成立，斗争锋芒就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武装——治安大队，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战的真面目，开展反帝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这样，治安大队与大同会矛盾越来越大，郭前旗出现了敌我相争的严重局面。在县城周围，一些军警宪特、地主恶霸和盗寇惯匪组成的土匪为虎作伥，进行垂死挣扎。常驻扎在城镇的，素有前郭“一霸”之称的陈达力和他的治安大队，推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断制造磨擦，到处叫嚷大同会是共产党的组织，扬言抓大同会成员，斩草除根，并派人监视大同会活动。尽管一个时期，整个城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街民不安，气氛森严，形势险恶，有的人也动摇

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同会成员坚定了革命决心和必胜信心，他们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北满专员兼白总队司令员夏尚志率队伍来郭前旗临时驻防。大同会领导接受夏尚志同志关于组建地方人民武装的意见，曾派人分三路到农村招兵，共招一百八十余人，成立了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去扶余县在驻军帮助下进了整训。这样，在郭前旗历史上就出现了两个对峙、并存的地方武装力量，一个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同会的蒙古人民革命军，一个是奉蒋介石国民党之命改称的“维持地方治安”的治安大队。这种对峙并存的局面直至一九四六年初治安大队和革命军合并，改编成为郭前旗蒙古骑兵独立团为止。

一九四五年“九·三”抗战胜利后，黎晓初、田铁军等同志响应党中央开辟东北解放区工作的号召，从关内到东北怀德，后经扶余县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被派到郭前旗工作。时隔不久，遵照中共吉江省委、吉江行署和吉江军区指示，经曹里怀、郭峰等领导同志反复工作后，决定把革命军和治安大队合并，改编成立“郭前旗蒙古骑兵独立团”，团部设一部二处，下属三个营。任命黎晓初为独立团政委，高万宝扎布为副政委，陈达力为团长。对营、连干部进行重新调整，作了适当安排。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秩序，团属三个营部分别设在王府、新庙和大老爷府等地。蒙古骑兵独立团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军区的要求，曾几次抽调力量，配合八路军进行剿匪活动，受到人民的赞扬。

一九四六年五月间，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帮助和支

持下，大举进攻东北，我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北撤。驻防在郭前旗的八路军，为了更有效地消灭国民党的军队，撤防到白城市。当时，郭前旗除留部分老干部坚持做地方工作外，军事力量主要的是蒙古骑兵独立团。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之后，郭前旗基本上处于三面受敌，形势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蒙古骑兵独立团内部发生了（原治安队）叛变事件，即一营中的治安队改编的部分人向原革命军战士开枪射击，我一名排长牺牲，叛军向农安方向逃窜。驻防在大老爷府的三营营长包清俊，既不服从陈达力指挥，又背叛了共产党，在西部公开的召集当地地主恶霸会议，企图阻碍党领导的反奸剿匪斗争，对抗骑兵独立团的调动。一营中的原治安队公开叛变，三营不服从命令，陈达力感到投降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和关兴武等人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刘殿海等勾结，暗地和进驻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联系。国民党军队派便衣特务为他送来委任状，任命陈达力为国民党新兵旅旅长。此时，正值黎晓初和陈达力率蒙古骑兵独立团从农安边界剿匪归来，途经王府屯返回县城后的时候。陈达力同其亲信密谋，有意将抽调集中参加剿匪的一、二营和警卫连指战员安排在城外指定的地点驻扎，进行频繁活动。他们暗地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妄图杀害我骑兵独立团干部，伺机带叛军投敌的阴谋诡计，已被我吉江军区全部掌握。面对这种严重恶化的局势，省军区、行署和当时旗委主要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以陈达力为首的一伙反革命分子谋杀叛逃问题。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初三、吉江军区举行宴会，以宴请蒙古骑兵独立团在剿匪斗争中有功军官为名，以八路军参谋长

喊通讯员给各位点烟倒茶为命令，一下子逮捕了以陈达力为首的七、八名反革命分子，缴械了预谋叛变的部分原治安队分子，清算了他们的罪行，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斗志，为革命战士撑了腰，出了气。混编在蒙古骑兵独立团内部的原治安队顽固分子闻讯陈达力被逮捕，在二营原副营长陈万才（蒙古名郎头，外号陈大耳朵）带领下，于当日晚间叛变，逃往离县城二十余里的四家子村集结，准备做垂死挣扎。

至此，郭前旗蒙古骑兵独立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军区和旗委直接关怀下，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走上了新的战斗历程，在除奸反霸，消灭土匪、土地改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稳定社会秩序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凯歌。

三、一起流血惨案

陈达力密谋叛逃被我军逮捕后，原治安队分子有的投诚，有的叛变逃窜。蒙古骑兵独立团二营原付营长陈万才和部分战士（多数是原治安队分子）驻扎在城西北的贺什勒屯，他没有参加宴会。警卫连指导员陈万令（蒙古名桑吉扎布）虽已被逮捕，但又逃了出来。这样，陈万才和陈万令纠合其亲信、二营一连副连长包福常（蒙古名查嘎）等带领残部，于当晚由贺什勒屯仓惶逃往城西四家子屯。随后，陈达力警卫连的排长谢凤阁（蒙古名昌布拉西）也带领部分残兵，追赶到四家子屯与陈万才等叛军会合。

叛逃的原治安队残部集结在一起约百余人。他们到四家子屯以后，分别住在谢凤阁家和大地主包文奎的后大院。叛军虽有驻地，但军心涣散，既防我军追击，又怕和土匪相迁，

虎狼相斗。所以，一些头目集聚在包文奎西下屋密谋对策。陈万才、陈万令、谢凤阁、陈士杰（蒙古名桑文大来）和一些骨干，如包占山（也称包福常）、周庭栋（蒙古名丹毕宁布）、谢凤春（即谢凤阁弟弟）、吴占胜（蒙古名铁本太）等参加了这次策反会。他们坐卧不安，集中谋划四个问题：①叛逃后散乱，没有指挥头目，谁能承担此职，要火速解决。研究时，陈万才提名把其兄长陈荣久（伪达里巴行政屯屯长，惯匪局东、报字“三点”）接来当头目。他说陈荣久同土匪关系密切，还有些“作战”经验。最后决定：陈万令、谢凤阁和包占山等去接陈荣久，再谋后策；②准备劫救陈达力，但又有后顾之忧。陈达力侄儿陈士杰听说我军北撤，介绍这一情况后，陈万才、谢凤阁当即主张去前郭镇内抢救出陈达力。但是，他们这种狂妄计划却是一纸空文。因为，镇内有八路军，还有地方人民武装力量，叛军人少力弱，又怕鸡蛋碰石头，自投罗网，此谋未逞；③妄图借我军战略北撤之机，在新庙站附近设卡劫救陈达力。但是，他们尚不知我军北撤时间，故难定论，等候再议；④叛军逃窜到四家子预感距城较近，不能久占。为防我军跟踪追击，他们决定当晚撤出此地，等候陈荣久再谋行动计划。叛军一些核心人物合谋之后，先派人去达里巴屯接陈荣久，并于当晚十二时左右，在陈万才带领下又逃到托泥嘎屯，集结在胡营长家。

第二天是农历五月初四，天刚放亮，陈万令、谢凤阁和包占山等人接来陈荣久，途经四家子后到托泥嘎屯，走马上任充当了这伙叛军头目。陈万才见到其兄长陈荣久，就象有了主心骨，有了靠山一样诉说：“我们团长（指陈达力）被

八路军逮捕后，我们逃出来了。三哥，你把这个队伍带走吧，我是没地方带呀！”陈荣久沉思着，接着几个人插话后，在陈荣久主持下，有陈万才、陈万令、谢凤阁、包福常、韩凤仪和陈士杰等人参加，开始合谋对策，研究怎样救出被捕的陈达力及其一伙反革命分子等问题。陈荣久首先开腔，他说：“我们治安队人少，得联系“三里三”（即张振铎）、“金甲龙”（翟洪生）、让他们来支持我们……”周庭栋接着说：“要和他们联系上，我们合起来能有三百人，到镇内救团长都行。”陈荣久一摆手：“不行！城里那么多八路军，我们去就得送死。”陈士杰听陈荣久这么一说，他献上一策，说大同会要退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必带走陈团长。最后，他们预测了北移时间，陈荣久综合伙伴的计谋，咬牙切齿地做出决定：“共军北撤，必经刘家围子。我们能联络三百多人，地形地物熟，设下埋伏，进行截击……，陈万才听其兄长出的道，欢喜若狂，赞成这个道出得对。他们这一伙叛军头头合谋之后，派人给土匪缙子送信。当天中午，“三里三”和“金甲龙”赶到托泥嘎屯相见，策划了去刘家围子的时间和具体事宜。晚间，这伙叛军由托泥嘎屯出发去刘家围子屯，准备截击我军北移，达到所谓劫救陈达力等被捕人员之目的，以谋东山再起。

刘家围子位子郭前旗县城的西北，距旗所在地三十华里，地处六家子交界，公路从围子东边穿过，屯后是贯通南北的铁路沿线。当年，道西边围子里住十几户人家，东西两侧住有四十来户老百姓。住在刘家围子屯的老户郑万有、守仁、赵常林和袁景林等，是叛军伙同土匪制造刘家围子流血惨案的目睹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无情地揭露出敌人的残

暴罪行。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是历史延续下来的端午节。刘家围子屯的老百姓同其他各屯一样，采艾蒿、煮鸡蛋、做面食等，忙活的挺欢，准备过五月节。大约在早晨五点钟左右，叛军从面南边骑着马窜进屯里。他们一进屯就叫老百姓烧水、踹马，各家做熟的饭菜也给吃了，真是祸国殃民的叛匪。饭后，有喝茶水的，有擦枪和站岗的，还有挖战壕的。公路两侧的围墙都抠成了枪眼。惯匪头子陈荣久还将其豢养的“三里三”、“金甲龙”两个痞子二百来匪徒安置在六家子和姜家围子一带待命，并约定埋伏时间和以枪声为令，配合叛军伏击，劫救陈达力等。

设置埋伏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未见我军北移。这时，他们更改计划，准备集合“队伍”，去攻打我骑兵独立团二营所在地新店。叛匪刚到公路上集合，陈荣久带领土匪头子“三里三”等人从路东走过来，等候训话。这时，陈达力小老婆打发两个小孩（其中一个陈达力内弟）给陈万才送信，说陈达力要被枪毙，应快设法救出来。紧接着，是陈达力的通讯员丹毕敖尔卜赶来禀报，他说：“陈团长被枪毙后，我穿便衣跑出来的”。惯匪头子陈荣久虽被迎头一击，但他的反共本性并不能改变，故做镇静地说：“一定要为哥哥（指陈达力）报仇。”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一辆载着我军指战员的汽车从郭前旗沿着公路奔太蚩县疾驰而来。陈荣久等人当即命令叛匪就地散开，准备截击。汽车刚入刘家围子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叛军和土匪随着指挥枪声一响，喊杀声、枪声连成一片，匪徒们集中火力向我军汽车上下射击。在汽车上的我军指战员开